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Annual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曹中建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编



1999—2000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Annual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曹中建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曹中建

副 主 编：张新鹰

执行副主编：于 光

编 辑：王子华

黄夏年

陈 平

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 曹中建

现在即将出版的是《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第三本,也是旧世纪的最后一本或者说是新世纪的第一本。

当我们马上要编定这本年鉴时,世界宗教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决定毁掉境内的所有佛像,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塔利班毁佛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很多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即在阿富汗境内已有1700余年历史的这宗古老文明的遗产,从此不复存在。这肯定是人类社会的悲哀。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人们虽然已经能够克隆出人类自己,但是大佛却是不能克隆出来的;大佛只能是毁一个少一个。

由巴米扬大佛的毁灭,使我想到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巴米扬大佛无疑是信仰的产物,如果没有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这尊高57米的大佛是决不可能造出来的。同样,如果没有信仰,这座历尽沧桑的大佛也不会毁于炸药之下,所以对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信仰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了信仰,而信仰狂热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对宗教信仰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看,宗教的研究更应该抱这种态度。

我们编辑这本年鉴的目的,就是想“为我国学者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为我国政府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依据,为我国的宗教界良好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思路。”巴米扬大佛的毁灭,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编辑这本年鉴的决心。因为宗教仍然是当前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宗教研究在我国仍然是正在不断发展的热门学科之一。

20世纪的中国宗教,经历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中国的宗教学,真正发展壮大,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宗教研究开始进入了体系创新的阶段,取得了不少成果,为顺利地进入21世纪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当前中国宗教学研究,总的来说是较为令人满意的,其表现的特征是:关

心宗教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参与宗教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撰写出版的宗教学研究著作越来越多,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质量越来越高,可以说,宗教学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就当前的现状而言,宗教学科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是扩大了,特别是与宗教有关的边缘性或交叉性的新学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一些传统的宗教,如佛教、道教等等,研究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成果日益丰厚,有些领域的成果甚至可以与外国同行的成果媲美,与国外的研究接轨。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这表现在:热的越来越热,冷的越来越冷。例如,佛道教的某些研究课题非常热,而宗教学理论的某些研究比较冷。值得提出的是,不管在热中抑或是在冷中,理论的萎缩和滞后的现象日益明显,特别是宗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我们仍然处在译介国外的宗教学理论和专著的水平,离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呼唤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的出现!

新世纪伊始,世界各大宗教仍很活跃,一些新兴宗教乃至邪教也“兴盛”一时。我国的邪教“法轮功”虽然不是宗教,但它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其所使用的一套基本术语,都是盗用了传统的佛道教名词。这就对我们的宗教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视野还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眼光还要进一步放远,我们的理论研究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成果还要进一步增多,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现实需要。如果说,这本《中国宗教研究年鉴》能在这方面起到某种指南或提示的作用,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愿新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对未来的宗教研究事业充满信心!

2001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曹 中 建(1)
-----------	----------

专 稿

宗教学科“十五”规划调研报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1)
新中国宗教研究 50 年	戴康生(25)
“法轮功”:愚昧、落后、迷信、腐朽	卓新平(38)
应当重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	吴云贵(41)

研究综述

宗教与社会主义研究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综述	郑 开(45)
中国宗教立法工作的回顾	张伟达(53)
宗教学理论研究	
中国萨满教研究 20 年	孟慧英(64)
佛教研究	
百年中国魏晋南北朝佛学研究综述	彭自强(73)
当代禅宗文献研究述评	邢东风(87)
20 世纪寺院经济研究状况述评	白文固(98)
中国石窟寺研究百年及展望	顾 颜 芳 张丽明(108)
克孜尔石窟考察与研究世纪回眸	赵 莉(116)
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	陈 灼(132)
活佛转世研究综述	许德存(142)
1999 年中国大陆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黄夏年(149)
2000 年中国大陆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黄夏年(158)
道教研究	
20 世纪道教工具书编纂情况综述	周 冶(168)
道教文学研究	张松辉 逯爱英(174)

20 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	蒲亨强(178)
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盖建民(192)
净明道研究	张晓粉(203)
“1999 年武夷山道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进国(207)
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丁培仁(212)

基督宗教研究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圣经文学研究综述	梁 工(216)
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早期研究综述	耿 昇(232)
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	杨富学(251)
台湾新士林哲学	耿开君(259)
“中国当代基督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卓新平 许志伟(263)

伊斯兰教研究

世界伊斯兰教史研究	秦惠彬(266)
伊斯兰教法学研究	秦惠彬(269)
伊斯兰教义学研究	秦惠彬(272)
伊斯兰文化研究	秦惠彬(276)
伊斯兰哲学研究	秦惠彬(279)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	秦惠彬(282)
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秦惠彬(286)
苏非主义研究	秦惠彬(291)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研究	秦惠彬(294)
1999 年—2000 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	张世海(298)

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研究

宋代神祠信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皮庆生(304)
近 50 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研究与前瞻	郑志明(310)

资 料

中国宗教学者撷英	于 光(327)
部分宗教学著作简介	于 光(335)
1999 年—2000 年我国 8 种宗教研究专业刊物篇目	(346)
1999 年—2000 年我国宗教学及宗教类新版图书简目	于 光(379)
宗教学及宗教通论	(379)
佛教	(381)
道教	(388)
伊斯兰教	(390)
基督宗教	(390)
其它	(392)
附:邪教与揭批“法轮功”	(395)

1999 年—2000 年我国部分报刊宗教学术论文、资料目录	陈 平 王子华(397)
无神论;宗教政策、宗教事务;宗教学通论	(397)
宗教与文学艺术;宗教文物;宗教概况;宗教史	(402)
神话、原始宗教及其残余;民间信仰	(411)
佛教	(416)
道教	(425)
伊斯兰教	(428)
基督宗教	(431)
其他	(435)
1999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部分重要学术活动	
及相关事项简记	于 光(440)
1999 年—2000 年我国宗教工作与宗教活动大事记	胡绍皆(443)
后 记	曹中建(452)

专 稿

ZHUAN GAO

宗教学科“十五”规划调研报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 “九五”期间研究状况的回顾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推动下,积极回应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深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真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突破和实质性进展,整个宗教学科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特别是“九五”期间,宗教学研究深入发展,日趋繁荣: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科研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各种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国家教育、科研系统和党政部门设立的各类宗教研究、教学机构已达 60 多个,其中专业研究机构超过 20 个;宗教类刊物 60 多种,其中学术研究刊物 7 种;据不完全统计,近 5 年来,出版宗教类图书 1000 余种,每年发表的宗教类学术论文超过 1000 篇,并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宗教学各领域的繁荣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学术建设,也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宗教学理论研究

我国的宗教学理论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经过近 20 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各分支学科——如比较宗教学、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等——的研究从无到有,都已有人员涉足;但格局尚不平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宗教学基本原理、宗教社会学、宗教史学、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等方面,其间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有力资助。

宗教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持续表现在关于宗教本质和属性的讨论上。80 年代初的“南北鸦片战争”,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具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

198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宗教学通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立场和方法来建构中国宗教学理论。主持人吕大吉从宗教观念、宗教感情或宗教经验、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四个方面(所谓“宗教四要素”)概括了宗教的本质和特征。在对“四要素”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吕大吉在中国宗教学界第一次提出了对宗教的定义:“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的社会文化体系。”^①1989 年,专著《宗教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1999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 年,吕大吉又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将上述定义修订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的社会文化体系。”^②吕大吉对宗教本质(定义)的论述是我国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引起了不绝如缕的反响。

随着宗教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拓展,许多学者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立场,突出宗教的社会性,来定义宗教。认识并强调宗教的文化属性,提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宗教学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重大突破。宗教文化说自 80 年代初已悄然出现,至 90 年代则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宗教研究的前提之一。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宗教,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现象,宗教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根基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摆脱了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宗教的片面性。

“九五”以来,宗教学理论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更为卓著,国家给予资助的力度也有所增强。例如,列入“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宗教学理论方面的课题就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吕大吉主持),“宗教神秘主义研究”(王六二主持)、“宗教与伦理”(李书有主持),“新兴宗教研究”(戴康生主持),“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主持),“宗教学思想史”(何光沪主持),“宗教对话”(王志成主持)等,立项数量和平均资助金额较“九五”以前有很大增加。以上研究课题及其最终成果正为中国宗教学理论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增添基石。戴康生主编的《宗教社会学》^③和《当代新兴宗教》^④特别重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着重论述宗教与社会变迁、宗教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潮流的关系。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维护并确立了我国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宗教错误而片面的理解;并对我国的宗教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吕大吉、何耀华任总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⑤,广泛收集中国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历史资料 and 各类文献,是“九五”期间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国内外获得巨大反响。宗教史学研究应该提到的成果有牟钟鉴、张践合著

① 吕大吉:《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5 期)。

②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79 页。

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④ 东方出版社,1999 年。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999 年,6 册。

的《中国宗教通史》^①,这是一部按朝代划分论述阶段的宗教史著作,用上下两卷的篇幅铺叙了中国从上古到现代的宗教发展演变史,是了解中国宗教历史作用和文化特色的良好读物。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院重大课题“宗教改革史”(何光沪主持),这将是一部多卷本的宗教史学巨制,它的完成,可以给现实中的宗教进行符合社会要求的必要变革提供历史的、理论的依据。

我国宗教学理论建设的重点之一是翻译介绍外国宗教学理论的先进成果。在西方,宗教学理论各分支学科经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理论的研究也经过了一个“拿来主义”的必然阶段,即以介绍、梳理、评论西方各宗教理论流派的形成发展、理论主张为研究重点的阶段;至于如何运用这些西方的理论针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目前尚在摸索,比如,部分宗教学理论研究者借助西方宗教理论的“他山之石”,尝试着分析探索中国宗教的性质与发展动力。

20多年来,中国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奠定了宗教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同时,我国宗教学理论方面的人才辈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业研究人员队伍业已形成,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带头人逐步脱颖而出。

二、当代中国宗教的政策理论研究

近20多年来,由于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的实际推动,以实际工作为出发点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理论研究萌发了新的生机。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作为当代中国政教关系的重要文献,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宗教的政治及社会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如此,宗教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里能够或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就成为我国宗教理论界和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此,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上问题自80年代初提出伊始,就在学术理论界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和切磋,围绕着该问题及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怎样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成为中国当代宗教研究领域里的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问题。

鉴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历来的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都予以高度重视,自“六五”到“九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均大力资助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项目,而当代宗教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对这方面研究做出很多安排。而有远见的党政机关如国家宗教局,还向有关科研单位投入了一定资金加以扶助。近20多年来,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紧紧围绕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问题,立足于当代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在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同期提供的重要支持之下,不断深化发展,经历了以下的过程:

(一)新时期之初,当代宗教的政策理论研究集中在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方面是对之前教条主义的宗教观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我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宗

^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册。

教学说加以系统的整理。换言之,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原则,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断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和正常宗教活动的合法性得以确认。

(二)80年代中叶以来,学术理论界基本上摆脱了“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窠臼,较少纠缠于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与宗教神学的分野,而是基于“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原则,围绕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在罗竹风主持下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①一书,摆脱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宗教的束缚,把宗教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加以分析和考察,并且提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之外的心理根源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必然性、长期性及其性质和社会作用,论证了:由于信仰宗教者和不信仰宗教者在政治经济利益上存在着共同的基础,所以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宗教与其所植根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协调的。经过理论的澄清和实践的检验,宗教必须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观点就由思想理论界的意见变成了社会各界的共识。

(三)90年代,江泽民同志把宗教工作的指导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其核心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至此,思想理论界的学术意见和研究成果被纳入党的理论主张和政府的政策,成为党和政府关于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正式表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戴康生、彭耀合著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②也是关于当代中国宗教,特别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它从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趋势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论述中国宗教的现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此后,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者根据某地或某教的具体情况,结合多方面的地方性要素,围绕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命题,积极探讨宗教在维护地区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正视其消极作用。

江泽民同志的“三句话”,特别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直接主导了“九五”期间当代宗教问题的研究。此外,宗教的文化属性也得到了强调,而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宗教热至少部分地证明了作为历史遗产的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现代化的动力不可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诉诸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在“九五”期间,宗教和现代化关系问题、宗教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宗教道德的涵摄作用问题,以及新形势下各地方和各宗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等,成为当代宗教研究领域里的重点课题。近年来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趋向是将当代宗教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民族,以及各种地方性因素结合起来,具体地考察宗教在稳定社会、道德建设和推进现代化等方面的积极抑或消极的作用,从而拓宽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领域。

“九五”期间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理论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②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面：

(一)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方面,由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命题的提出和阐述,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但这些大多是关于宗教方针和政策的反复阐述,在理论上尚有待于新的突破。

(二)市场经济时代的所谓道德滑坡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的紧迫性,而传统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应该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当然也要注意克服宗教道德中的某些消极因素。

(三)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区域性或地方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立足于地方特点的宗教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1998年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就多为地方性的特殊问题;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获全国统战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的成果则是北京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北京宗教现状研究》^①。再如,港澳台地区宗教对大陆地区的影响问题也成为近来研究的重点,国家社科基金2000年立项的“珠江三角洲宗教状况、特点、趋势与对策研究——兼谈港澳宗教对粤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的科际整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宗教问题日益紧密地和民族、地区稳定、国家安全、人权、法律以及社会诸问题结合在一起。

(五)世界宗教现状的宏观研究,作为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国际大背景或参照借鉴对象,在宗教学科内外形成了争相关注的热门。在这方面,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开展的各国政教关系研究和宗教法规调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把中国宗教置于全球视野当中进行观察,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方法。

三、佛教研究

在中国,佛教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但科学意义上的佛教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汤用彤、吕澂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奠定了中国现代佛学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的学术基地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者不断成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至90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发表的佛教研究论文的数量,已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总和。综观20年来,特别是“九五”以来我国佛教研究的状况,可以总结如下几点:

(一)佛教史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佛教史研究始终是佛教研究中的重点。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②、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③与郭朋的多部佛学论著,对深化佛教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主要局限在中国佛教领域,而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又以唐以前为主,在唐以前佛教史研究中又以显教为主。总之,

① 冯今源主持,内部研究报告,1998年。

②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8卷本,现出版1—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8年。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把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较多,注目各地佛教的不同特点的较少。近10年来,特别是“九五”以来,上述研究格局开始被打破。

1. 首先,继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①之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印度佛教、日本佛教、朝鲜佛教的著作。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②、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③、杨曾文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④、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⑤、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⑥等等,使我们对中国佛教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⑦则是我国第一部对全世界佛教的发展历程作综合性研究的专著。

2. 其次,唐以后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西夏佛教和云南阿叱力教的研究方兴未艾,而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更逐步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研究成果有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⑧、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现代调适》^⑨、徐荪铭的《世纪佛缘》^⑩、潘桂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居士佛教史》^⑪、陈兵与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⑫以及郭朋的《太虚思想研究》^⑬、《印顺佛学思想研究》^⑭等;此外,王雷泉的一系列论文也很有见地。

3. 近年来,藏传佛教与密教的研究成为热点,出现大批论著,但真正客观的科学的论著还比较少。其中,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⑮、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⑯、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⑰、吴立民与韩金科의《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之研究》^⑱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唐密的研究,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

4. 地方性佛教的研究越来越活跃,以此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频频不断,新的论著不断涌现,如:《杭州佛教史》^⑲、《近代杭州佛教史》^⑳、《福建佛教史》^㉑、《江西佛教史》^㉒、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③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1999年,2册。

⑥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册。

⑫ 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⑰ 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⑱ 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⑲ 冷晓著,杭州市佛教协会,1993年。

⑳ 冷晓著,杭州市佛教协会,1995年。

㉑ 王荣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㉒ 韩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回鹘之佛教》^①、《澳门佛教》^②、《五台山佛教史》^③、《江南佛教史》^④等等。这些研究促使中国佛教的研究更加细密化,但从总体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地方性佛教的研究将仍然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5. 此外,近年在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僧人生活等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⑤对中国僧官制度的产生与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佛教寺院研究方面,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⑥以佛寺为切入点,研究了佛教文化怎样逐步中国化与怎样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其文化功能。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⑦则以敦煌僧团为标本,详细解剖了佛教僧团的行为规范,对于研究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僧团的活动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佛教宗派研究,其中唯识、华严、天台、净土,特别是禅宗研究取得相当的进展。20 世纪上半叶,唯识研究曾风靡一时,近年来,沉寂多年的唯识研究重新获得新的发展。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将唯识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现象学进行比较研究,对古老的佛教哲学作了全新的现代诠释。国家社科基金 1999 年资助了杜继文主持的“唯识哲学研究”(计划 2001 年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的青年研究项目“中国 20 世纪唯识思想研究”(魏德东主持)则已经完成。华严、三论、天台、净土研究方面,有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⑧、杨永泉《三论宗源流考》^⑨、潘桂明《智顗评传》^⑩、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⑪、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⑫等专著问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佛教宗派研究当中最为人们关注、成果最为丰富的还是禅宗研究。在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较为突出的成果有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⑬、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⑭、由李申合校、方广钊简注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⑮以及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禅宗典籍;在禅宗史方面,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则有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⑯、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⑰、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⑱、潘桂

① 杨富学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② 何建明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③ 崔正森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2 册。

④ 严耀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⑤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2 册。

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⑧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⑨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⑩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⑪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⑫ 巴蜀书社,2000 年。

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⑭ 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⑮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

⑯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⑱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①;此外,诸如《印度禅》^②、《如来禅》^③、《祖师禅》^④、《日本禅》^⑤、《东山法门与禅宗》^⑥、《石头希迁与曹洞宗》^⑦、《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⑧等论著,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而《禅学与玄学》^⑨、《禅与老庄》^⑩、《禅宗与中国文学》^⑪、《佛道诗禅》^⑫、《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⑬、《禅与中国园林》^⑭、《禅与东方文化》^⑮、《禅思与诗情》^⑯等论著,则从不同视点探讨了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将禅宗研究引向深入,使禅宗研究更加蔚为大观。

(三)佛教文献学越来越引起重视。佛教文献学包括佛教文献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经录藏经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经的编纂及其电子化。目前,我国佛教文献学的工作主要还是后二者。

就经录与藏经的研究而言,敦煌遗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为传统的佛教经录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主要成果有方广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⑰等。在写本藏经及刻本藏经的研究方面,新的藏经不断被发现,研究也不断深入。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佛教典籍的整理而言,经过13年的努力,《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⑱共106册已经全部出版。这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藏经版本。曾获国家古籍整理荣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荣誉奖。其电子版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勘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已经完成“丹珠尔”部分,正在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也有一定的进展;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正在逐步展开,结集收入方广钊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⑲分辑出版。整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意义越来越凸显,我国学者除在国内摸清家底以外,也积极参加了国外藏品的编目和研究,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①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② 方广钊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洪修平、孙亦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 董群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 梁晓虹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 萧蓬父、黄钊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

⑦ 王兴国、徐荪铭主编,岳麓书社,1997年。

⑧ 姜伯勤著,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⑨ 洪修平、吴永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⑩ 徐小跃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⑪ 谢思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⑫ 赖永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⑬ 黄河涛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⑭ 任晓红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⑮ 季羨林等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⑯ 孙昌武著,中华书局,1997年。

⑰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2册。

⑱ 中华书局,1985—1997年,共106册。

⑲ 宗教文化出版社,自1995年12月至1999年6月,已出版7辑。

四、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70年代末以来,道教研究恢复了生机,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重新开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设立道教研究室,四川大学成立以研究道教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促使道教研究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在许多方面与道教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群体的文化人类学特点相联系的民间宗教,也受到来自宗教学术工作者专业目光的注视。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90年代初就将道教研究室改名为“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之外,天津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民间宗教研究中心。经过20年来的发展,道教及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取得了全面进展和新的突破,尤其是在文献、历史及教义思想的研究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

在道教研究方面,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①是全面系统研究《道藏》文献的第一部著作。胡道静、陈耀庭等人编集的《藏外道书》^②收集明清道书千余种,在道教文献的编集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两部道教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③和卿希泰主编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④,一部《道教通论》^⑤——以及大型辞书《中华道教大辞典》^⑥的撰成,为我国的道教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在断代史方面,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⑦、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⑧、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⑨和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⑩则可圈可点;在专题研究方面,隋唐重玄学和金元全真道思想的研究是道教研究的前沿,成绩也较突出,卢国龙的《中国重玄学》^⑪和张广保的《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⑫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民间宗教研究方面,继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⑬之后,马西沙、韩秉方积10年之功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⑭,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水平,该书1996年和1999年分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和国家社科基金科研成果三等奖;濮文起主编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⑮则是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为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提供的一部重要工具书。此外,林国平的《林兆恩与三一教》^⑯、徐小跃的《罗教·佛教·禅学——罗教与〈五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巴蜀书社,1989年迄今。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96年。

⑤ 牟钟鉴等著,齐鲁书社,1991年。

⑥ 胡孚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⑧ 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⑪ 华夏出版社,1996年。

⑫ 三联书店,1995年。

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⑮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

⑯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